

辽宁考古文集

(二)

■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1324314

辽宁考古文集(二)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淮阴师院图书馆1324314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一部关于辽宁地区近年考古资料与研究论文的文集。全书分为简报篇和论文篇两大部分,内容侧重于燕秦汉至魏晋时期的考古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辽宁省近年来的考古工作成绩和研究成果。

本书可供考古学、博物馆学、历史学等研究学者及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辽宁考古文集. 2 /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7-03-028172-2

I. ①辽… II. ①辽… III. ①考古工作—辽宁省—文集 IV. ①K872.3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5254 号

责任编辑: 宋小军 / 责任校对: 陈玉凤

责任印制: 赵德静 / 封面设计: 北京美光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0 年 7 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10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30 1/2 插页: 6

印数: 1—2 500 字数: 723 000

定价: 1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辽宁考古文集》(二)

编辑委员会

主任：田立坤

副主任：李新全 华玉冰 吕学明

委员：辛 岩 万 欣 朱 达 王来柱

梁振晶 孙立学 万雄飞 李龙彬

主 编：田立坤

编 辑：魏 凡 万雄飞 郭 明

关于辽宁燕秦汉至魏晋时期考古的 若干问题（代序）

郭大顺

辽宁省考古学会这次在新宾召开学术研讨会，并以秦汉魏晋时期考古作为讨论的重点，从我省近 20 多年考古工作的发展过程看，是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因为辽宁地区秦汉魏晋时期的考古工作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做的较多，如辽阳汉魏时期遗址与墓群的发掘、燕秦长城的调查和以冯素弗墓为代表的十六国时期墓葬的清理发掘等。不过 70 年代以来，我省考古工作进入较为快速的发展时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将重点放在辽西地区，放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战国以后的考古工作做得相对较少。虽然 1979~1982 年全省文物普查后有所改进，重要的如姜女石秦宫遗址的发掘，但与先秦时期考古相比，仍显薄弱。辽宁省秦汉魏晋时期考古真正有较大进展是在近些年，表现为不仅有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和相当资料的积累，还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

我的研究重点不在这一阶段，但长期在辽宁从事考古工作，也经常有所接触，觉得这一时期的研究与先秦时代相比，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与大家讨论。

一、分期断代

目前对常见器物特征的把握仍然不够细致和准确。如战国与汉，西汉与东汉，西晋与东晋，辽与金之间典型器物的差别，以及每一个阶段更详细的分期和标准器物的把握。中原地区这些阶段的分期是很细的，对每一时段特征性器物较为敏感的变化点也掌握较多。从东北甚至大北方地区来看，辽宁地区的优势就在于这一时期的考古文化经常有典型中原器物共出，特别是辽西地区，这是对当地文化断代最方便的标准和工具，也是从考古类型学上断定东北以至东北亚地区诸考古文化年代的一条最为可靠的途径和标尺，但目前还没有把这一优势充分发挥出来。究其原因，一方面与资料积累程度和研究深度有关，如典型器物类型学划分仍较为粗简，当然也可能与北方及东北地区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与中原地区有所不同有关，如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都有不同于中原之处。还有与中原地区发展的同步性与不平衡性。这两个方面都是在建立年代序列和选择断代标准器时需要认真考虑的。

为此，在省及重点市县，可以考虑逐步积累实物资料，建立既系统又有地方特点

的标准器物的资料库,作为研究比较和教学实习的基地。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秉琦先生一再倡导有条件的各地建立以考古标本为主要收藏对象的考古实验站,就包含有这方面的内容^[1]。

二、与文献的结合

这一时期考古研究与前段相比,一个大的区别在于文献记载渐多,考古资料与文献结合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重要方法和内容,因此要面对考古资料与文献如何有机结合的问题。对文献既要抱积极态度,充分利用,又要注意克服两种倾向,一是简单比附,甚至本末倒置,即用考古资料去套文献,这已是习惯性的研究方法,但对于一个掌握第一手考古实物资料的考古研究者来说,却是完全不可取的。在文献与考古资料结合方面的又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因过快考虑与文献结合而忽视了在考古资料的分析上下苦功夫,正确的治学态度是,宁可在考古与文献记载的结合上缓一步,也不能放弃对考古资料的详细分析。由于这些倾向的长期存在,已经出现因文献与考古资料结合上处理不好,而将这一时段有文献记载的优势变成包袱的情况。

这方面我的又一个体会是,由于古文献中对这一时期东北和北方地区的记载,有的略而不详,有的还似是而非。这就更要注重对文献记载的科学分析,包括去伪存真,特别是以考古研究成果对文献记载进行分析、筛选和评述。重视考古资料的规律性认识和归纳,在此基础上进行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的结合,往往是水到渠成的事。

为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考古学的学科独立性。苏秉琦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指出,考古学发展到今天,早已不只是“证经补史”,而是考古学以一门独立学科承担起复原历史的任务。表现为考古学已形成本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由此独立地探讨一些重大的学术课题,如中国文化起源、中国文明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等^[2]。不仅史前时期如此,文献渐多的先秦以后也不例外,也要坚持按考古学的方法,从分区、分期、分类型着手进行基础性研究,在这方面,考古材料和通过第一手考古资料独立研究得出的成果是第一位的,文献要服从考古。正如宿白先生在1996年黑龙江省“渤海文化研讨会”上所提醒的:“我觉得如果拿考古材料及考古现象来和文献对比的话,不能太拘泥,太保守。因为古人写文献,不是为我们今天考古服务的,因此,文献只能作参考,不能成为很重要的根据。”^[3]。2007年年初,我随沈阳市考古研究所姜万里所长和姜念思同志去拜访宿先生,他在谈到清初沈阳城“内方城外圆城四面塔”的独特规划布局源自喇嘛教的坛城曼陀罗而缺少文献记载时,又几次告诫我们,不要事先有框框,要尊重考古资料。

三、摸索自身的方法论

与此有关的就是注意创建和使用考古学的方法论。就辽宁省这一时期考古的方法

论而言，除了通用的考古方法以外，也正在摸索出自身的一些方法。举这一时期辽宁地区经常讨论的城址与族属为例。

（一）古城址的认定问题

辽宁地区已发现的战国到汉代城址甚多，不仅辽西，辽东地区也较多。如何与文献记载的郡县相吻合，是大家关注的课题，但分歧也很大。

我曾在《东北文化与幽燕文明》一书论述战国城址时，将有关学者在处理这个问题时的方法作一归纳：

一是苏秉琦先生在论述“古文化古城古国”时提出，商周时期的古文化古城古国是战国秦汉时期建立郡县的基础^[4]，这是一个在考察和寻找战国秦汉郡县遗址时具有指导性的观点和方法。就燕北五郡而言，由于加强与燕北各族的联系是燕国建立燕北五郡的直接原因，所以燕北已知的三大民族文化集团，即以冀北为活动中心的“玉皇庙文化”、以内蒙古东南为活动中心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和以辽东山地和辽西丘陵为活动中心的“辽宁式短剑文化”，他们各自的活动中心及分别建立的古国，应是寻找燕北五郡的重要指示器。即这些郡址的具体所在，可能与这三大民族集团的活动中心相距不远，或就是在这些古国所在地建郡的。

一是李文信先生在考证右北平郡平刚治所在内蒙古宁城县黑城子^[5]时，强调了确定这些战国汉代郡治所在的又一个方法和线索，那就是有关郡治所在，应在当时的交通要道附近，这也是值得考虑的一个因素。

二是徐秉琨先生在他的大作《辽宁发现战国陶铭四种考略》^[6]中，在通过陶铭考证有关战国城址时，针对战国燕北五郡在文献中记载甚少，五郡下的县制，在文献中几乎没有记录，而秦汉郡县记载渐多的情况，提出秦汉延用燕制，秦汉郡治大多是以燕国建郡作为基础的。尤其是在辽宁地区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城址和遗址，燕秦汉文化遗存往往共存，汉城的发现和堆积虽远较战国为多，但大都有战国文化层叠压其下，这样，从汉城上溯战国城，不仅有助于寻找战国五郡郡治的所在，尤其对燕时郡治下的县治的了解，很有意义。

在考察燕北五郡时还要考虑的一点是，郡治所在是有变动的，燕山以北正是民族消长之地，这种变动可能较为频繁，也就是说，一郡可能不只一地一城。如凌源安杖子古城、宁城黑城子古城与右北平郡的关系。这一点，许多学者都已注意到。

（二）族属的认定及与中原文化的关系

辽宁历史时期考古经常遇到的又一个问题，是当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并从中分辨当地诸民族各自的文化特征，进而与文献记载的族属相比较和对应。这在

考古资料上的反映,可能较文献记载要复杂得多。仅提出在考古发现中有些值得注意的一些现象。如:

战国中晚期的辽宁地区,燕式陶鼎、豆、壶逐渐占了主要地位,一般认为,这是战国中期燕昭王时“秦开却胡千里”设五郡后的反映。但在喀左城郊眉眼沟、朝阳十二台营子,甚至沈阳市热闹路发现的战国墓葬,所出鼎、壶形制,都有早于战国中期的线索,说明燕国在燕北设郡的时间可能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而其开始则可能在秦开却胡之前。尤其引人注意的是,1979年全省文物普查在朝阳十二台营子发掘的春秋战国墓葬中,与燕式鼎豆壶组合共存器类中,经常发现有一种有外叠唇的手制罐,其陶质、制法与燕式陶礼器差异很大,显然是当地原有民族文化包括辽东地区土著民族文化的特点,可能表明墓主人是当地人,是因接受燕式礼制而在埋葬制度上的反映。20世纪50年代在河北省唐山贾各庄春秋战国墓中就曾出现过这种手制陶器。这种燕式陶器与当地土著文化陶器共出的情况也见于辽东地区,如抚顺莲花堡遗址,过去较多注意这个遗址出土的一批战国铁器为燕国东扩辽东地区的实证,孙守道先生则提出当时在这一带居住的是秽貊族,证据是莲花堡遗址既出土典型燕式陶器,也出土土著文化陶器如手制的豆、叠唇罐等^[7]。这种当地文化因素与中原文化因素共存的情况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只是文化因素的消长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前期似当地文化因素更浓厚一些,而燕国在东北设郡县后,则接受燕国礼制的文化因素更多一些。

这方面有学者提出,中原王朝对北方民族地区经常实行的是“据点式统治”,进而由点到线^[8]。这以唐代在朝阳所设营州在考古资料上的反映最具典型性。在朝阳发现的唐墓,除集中分布于朝阳城内和城郊以外,周围地区、包括朝阳以西的燕山地区,从未有过唐墓发现的报道,反映唐王朝对北方唯一的中原州制的统治就是这种据点式的统治方式。汉代及以前应更是如此。所以在辽西和辽东地区的汉代城址及其周围,注意和分析典型中原文化因素与当地文化因素共出,就成为一种辨别诸民族文化特征及其与燕文化关系的重要研究方法。其实再向前追溯,《左传·定公四年》所记封康叔于殷墟要“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封唐叔于夏墟,要“启以夏政,疆以戎索”,都是这种统治方式与民族关系的反映。

最后说一点“周制”、“汉制”与“晋制”,这是读俞伟超先生著作时的一点学习心得。秦汉帝国解体,各地区势力包括周围各地区各民族纷纷建国,这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又一个大的阶段,其社会结构必然发生重要变化,史学家曾不同程度地触及这一课题,何炳棣先生对洛阳北魏都城布局的研究^[9],就是从社会结构变化入手的。从考古资料入手进行系统研究的,是俞伟超先生。俞伟超先生在对西周至汉晋的墓制变化作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周制、汉制、晋制的三大阶段^[10]。其中,由“汉制”到“晋制”的变化原因,主要在于社会等级制度由汉代的二十等爵制为基础的等级变为九品中正为基础的等级制,思想信仰则由于佛教、道教信仰的传播,引起对传统的“视死如生”观念的变化。结合辽宁考古材料看辽宁地区从秦汉到魏晋这一时期大的阶

段变化，集中表现为三大方面：一是城市规划布局；二是墓制的变化；三是精神生活（佛教东传）也进入新时期，佛教题材已逐步出现在从建筑到装饰的各个方面，表现出与中原地区同步的一面。但从已经发现的考古材料看，在这一阶段大变革过程中，辽宁也有自身的特点，变化程度或快或慢，表现出较多的不平衡性。如中国古代都城宫室与里坊以东西大道为界分置，主要建筑以南北中轴线布局始于曹魏时期，到北魏时成熟，而最新考古发掘证明，现朝阳老城区的三燕龙城已是这种布局，充分反映出慕容鲜卑是十六国时期诸民族中接受中原汉制最迅速的一个。但魏晋时期辽阳壁画墓的形制特点和壁画内容，则主要表现为东汉庄园经济的延续及与当地土著文化的融合，包括西汉盛行的诸侯王墓使用回廊制度到东汉后期已逐步消失，而在汉魏之际的辽阳棒台子1号墓和北园1号墓中仍在使用的这一回廊制度，直到两晋之际的上王家墓，还是多室的石室墓制，可见，由中原开始的以墓葬简化为主要特点的由“汉制”到“晋制”的变化，在辽东地区出现较迟，这种不平衡的情况并影响到周围地区，包括高句丽。所以，我们在作辽宁地区汉魏晋考古研究时，也应随时注意了解和掌握历史考古界对这一时期时代特点等方面的研究大趋势和新动向。

注 释

- [1] 苏秉琦：《再谈筹建考古实验站与课题问题——给山东省文物局负责人的一封信》，《海岱考古》（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
- [2] 苏秉琦：《建国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在北京市历史学会、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纪念中国共产党六十周年报告会上的讲话》，《苏秉琦考古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299~305页。
- [3] 宿白：《在“渤海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北方文物》1997年1期。
- [4]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140~145页。
- [5] 李文信：《西汉右北平郡汉平刚考——宁城县黑城村古城址》，《李文信考古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225~233页。
- [6] 《辽海文物学刊》1992年2期。
- [7] 孙守道：《汉代辽东长城列燧遗迹考——兼论辽东郡三部都尉汉及若干近塞县的定点问题》，《辽海文物学刊》1992年2期。
- [8] 许倬云：《西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193页；韩嘉谷：《燕史源流的考古学考察》，《燕文化研究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 [9]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359~363页。
- [10] 俞伟超：《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兼论“周制”、“汉制”与“晋制”的三阶段性》，《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中国魏晋墓制并非日本古坟之源》，《古史的考古学探索》，文物出版社，2002年，359~369页。

目 录

关于辽宁燕秦汉至魏晋时期考古的若干问题（代序）	(i)
-------------------------------	-----

简 报 篇

辽西新发现的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群——兼论辽西第四纪地层的划分	(3)
朝阳北票章吉营子乡大凌河南岸考古调查	(13)
朝阳吴家杖子墓地发掘简报	(27)
康平五棵树沙场墓地调查清理报告	(41)
沈阳宫后里遗址及相关发现	(57)
东北燕秦汉长城的考古调查与研究	(66)
阜新两座汉代城址调查	(94)
凤城刘家堡子西汉遗址发掘报告——兼论汉代东部都尉治武次县址之地望	(101)
盖州农民村汉墓群发掘简报	(123)
朝阳松树嘴子汉城址调查	(133)
辽宁台安县孙城子汉代城址调查	(138)
新宾旺清门镇龙头山石盖墓	(142)
盖州沙沟子汉墓发掘简报	(165)
沈阳小东汉墓葬群勘探调查与发掘	(173)
沈阳上伯官城址和墓葬的调查及其研究	(193)
辽宁北票金岭寺魏晋建筑遗址发掘报告	(198)
辽宁北票市大板营子基地的勘探与发掘	(225)
朝阳袁台子发现汉魏慕容鲜卑牌饰陶范	(253)
大西沟门遗址发掘简报	(257)
朝阳白石水库管理局住宅楼唐墓	(269)
千山灵岩寺窖藏出土的铁器和瓷器	(278)
2008 年辽宁水下考古前期陆上调查简报	(284)

论 文 篇

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筒形罐研究综述	(295)
马面溯源	(304)
简释商周青铜礼器纹饰之饕餮	(309)
辽宁海城析木城石棚的性质与年代初探	(314)
鞍山地区出土战国秦汉时期铁器的初步探讨	(322)
辽北地区燕秦汉时期遗存的发现与研究	(331)
辽北燕秦汉长城及相关遗迹遗物的发现和研究	(347)
辽北战国汉时期多民族文化交汇的考古学考察——铁岭邱台遗址例说	(356)
从考古资料看西汉辽东等五郡郡治及都尉治的地望	(365)
大连营城子地区汉代墓葬及相关问题探讨	(391)
营口汉墓的分布、结构及葬俗特点	(400)
两汉时期匈奴和鲜卑考古遗存的对比分析	(405)
辽东地区东汉时期长颈瓶的源流及其相关问题	(414)
营口地区东汉文字砖反映的汉代丧葬礼俗	(421)
“铎”、“铎”小议	(426)
记喇嘛洞出土的一件元康三年“铜铎铎”	(431)
辽代墓葬出土的白瓷花口器	(440)
朝阳北塔发现的古玻璃器	(455)
张成墓碑考略	(460)
浅谈鞍山地区的辽东镇长城	(466)
承德避暑山庄保护与开发应当关注的两个问题	(470)

简 报 篇

辽西新发现的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群

——兼论辽西第四纪地层的划分

傅仁义 惠忠元 李阳城 刘亚婷

辽西境内以大、小凌河流域分布大量水系,在这些河域的一、二级阶地沉积着第四纪地层,另外本区喀斯特地貌发育,大部分是以奥陶纪石灰岩为主的基岩,这些碳酸岩类在水溶蚀作用下形成大小洞穴,为古人类生存和动物栖息提供理想的场所。近些年,随着大型基本建设的开展,辽西发现多处第四纪哺乳动物群地点,其中喀左帽儿山、朝阳马山洞、凌源沟门洞和喀左二布尺洞穴4个化石点较为丰富,这些动物化石的发现为辽西地区进一步寻找古人类活动线索和第四纪地层的划分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以下对这些新发现的化石地点做一简要记述。

一、喀左帽儿山动物群

喀左县帽儿山因山顶平缓,似帽子状,故称其为帽儿山。1994年10月,当地采石的过程中,发现一石灰岩洞穴,在堆积物中出土一件残破的肿骨鹿化石。同年对该地点进行了发掘,初步搞清了洞内堆积物的形成过程。

1. 帽儿山洞穴地质地貌

化石地点的地理坐标约为北纬 $41^{\circ}6'58''$,东经 $119^{\circ}17'49''$,位于喀左县兴隆庄乡章京营子村东山嘴居民组西南、帽儿山东坡的半山腰儿上,距喀左县县城(大城子)约4公里。化石地点的海拔约为320米。此地属辽西低山丘陵地区,大凌河上游,帽儿山东侧山脚下即为大凌河。洞穴底部距大凌河水面的垂直高度约为30米。化石地点地处较宽阔的大凌河河谷,由河床、河漫滩、一级阶地三部分组成,化石地点位于二级阶地之上。

帽儿山洞穴为一石灰岩洞穴,此石灰岩的岩性为花纹状白云质灰岩、竹叶状灰岩,属奥陶系下统的冶里组和亮甲山组。化石地点地层剖面如下:

①灰褐色表土,含灰岩角砾和磨圆度良好的砾石,厚20~40厘米。

②黄色亚黏土含钙质结核层。结核层呈圆形,胶结成层状条带,有2~3层,每层厚20~30厘米,结核层面由东向西倾斜,有少量化石,厚100~150厘米。

③棕黄—棕红色粉砂质黏土,夹厚30厘米的钙质结核层,层面由东向西倾斜,含较丰富的动物化石,如三门马、肿骨鹿等,厚250~300厘米。

④紫红色黏土,质纯,干燥后呈蒜瓣状,厚20~60厘米。

下伏地层为奥陶纪灰岩。

2. 帽儿山哺乳动物群

帽儿山哺乳动物群共有5目、10种属。因钙质胶结严重,致使大部分化石保存状况不佳,许多肢骨呈破碎状态,牙齿较完整的很少。10个种属为:鼯鼠未定种(*Myospalax* sp.)、翁氏兔(*Lepus wongi*)、狼(*Canis lupus*)、狗獾相似种(*Meles* cf. *meles*)、鬣狗未定种(*Hyaena* sp.)、棕熊(*Ursus arctos*)、三门马(*Equus sanmeniensis*)、野猪(*Sus scrofa*)、野牛未定种(*Bison* sp.)、肿骨鹿(*Megaloceros pachyosteus*)。下面对几个鉴定到属种的标本进行简单的系统记述。

3. 系统简述

啮齿目 Rodentia Bodich. 1821

鼯鼠未定种 *Myospalax* sp.

材料:两个较完整的左下颌,保留M1~M3(标本94KM-16、标本94KM-17);1件右侧下颌骨,保留完整齿列M1~M3(标本94KM-08);破碎股骨、胫骨、腓骨、尺骨、脊椎等。

描述:臼齿构造成“Ω”型,下齿式是1.0.0.3,M3较M1和M2略长,其舌面有一凹陷沟,唇面有两个凹陷沟。从对比金牛山的鼯鼠下颌骨标本来看,比较接近东北鼯鼠(*Myospalax psilurus*),由于未发现完整头骨,所以对头骨的枕盾平面性质尚不清楚。

兔形目 Lagomorpha Brandt, 1855

翁氏兔 *Lepus wongi* Young, 1937

材料:较完整的左下颌骨5个(标本89KM-16、17、18、20、21),基本保留完整齿列;完整右下颌2个(标本89KM-19、22);残右下颌2个(标本94KM-13、15),保留P4~M3;残左下颌骨(标本94KM-14),保留P4~M1,大量股骨、桡骨、尺骨、胫骨、腓骨等。

描述:下颌骨底缘略呈弧形,P4下缘处弧度最大,唇侧齿略高于舌侧,褶沟明显。P4形状有别于M1和M2,截面呈圆形。M1和M2结构相同,内外均有两个突起的棱,前叶高于后叶,并相对变狭。从P4到M1牙齿逐渐增大,M3双齿柱,后柱甚小。P3短,外侧有2直沟,前沟较浅,后沟较深。

食肉目 Carnivora Bodwich, 1821**狗獾相似种 *Meles cf. meles* Linnaeus, 1758**

材料：左下颌一件（标本 94KM-07），保留 P4 ~ M1。

描述：下裂齿 M1 较大，三角座与跟座近于相等，跟座呈盆形，有 5 个齿尖，下原尖高并大于下前尖，下后尖与下前尖相等。从下颌骨和牙齿形态特征、大小与金牛山的狗獾（*Meles meles*）接近。

鬣狗科 Hyenidae Gray, 1869**缟鬣狗未定种 *Hyaena* sp.**

材料：残前臼齿 1 枚（标本 89KM-13），保留齿冠部分。

描述：齿尖未经磨蚀，成锥形，从齿冠珐琅质残断的外壳状况看，是一幼年个体，珐琅质表面皱纹明显。

鬣狗是我国北方第四纪地层中一种常见的典型动物，周口店第一地点、庙后山等中更新世地层出土中国缟鬣狗（*Hyaena sinensis*），晚更新世地层出土最后斑鬣狗（*Crocuta ultima*）。近年来，在中更新世层中也发现最后斑鬣狗，如周口店第一地点第 3 层，金牛山第 5 ~ 6 层，说明最后斑鬣狗生存年代可提早到中更新世晚期。帽儿山的鬣狗材料甚少，且无主要裂齿，所以对种的鉴定带来一定困难。

奇蹄目 Perissodactyla Owen, 1848**三门马 *Equus sanmeniensis* Teilhard de Chardin et Piveteau, 1930**

材料：一个较完整的左下颌骨（标本 89KM-08），附 P3 ~ M3，但 M2 残；左下颌骨（标本 89KM-11），保留 P4 ~ M2，M3 残；同一个体的完整上颊齿（标本 94KM-03、标本 94KM-04），保留完整齿列；左上颌骨（标本 94KM-05），保留 M1 ~ M3。另外有零星牙齿，下前臼齿 1 枚（标本 89KM-07），上、下门齿及上颌吻部。

描述：下颌吻部保留左右两对门齿，内侧两对第二对门齿尚未完全萌出。整个颊齿明显比普氏野马（*Equus przewalski*）粗壮，上颊齿为方形，中附尖简单，不折叠，原尖长，马刺存在。下颊齿呈长方形，双叶呈环形，外谷略呈“V”字形。下吻部较窄，门齿与下颊齿之间齿缺较长。

偶蹄目 Artiodactyla Owen, 1848**肿骨鹿 *Megaloceros pachyosteus* Young, 1932**

材料：完整左上颌骨（标本 89KM-06），保留 P2 ~ M3，残左下颌骨（标本 89KM-05），存 M1 ~ M2；残右上颌骨（标本 89KM-04），存 M2；残左下颌骨（标本 89KM-01），存 M3；残右下颌 2 件（标本 89KM-02、03）。

描述：上前臼齿 3 枚，单叶，与臼齿形态有明显差别，齿槽呈新月型。上臼齿呈方形，双叶，外壁较光滑。下颌水平枝肿大，在 M3 下缘部位，横截面近似圆形，肿厚程度较大，向前渐变成椭圆形。整个牙齿粗壮，珐琅质粗糙，唇侧壁有皱纹，附尖和前齿带明显，齿柱很发育。

目前,在我国东北地区发现肿骨鹿的地点,只有金牛山和庙后山两处,从测量的数据和标本比较看,帽儿山的肿骨鹿更接近后者。金牛山的肿骨鹿,其肿厚程度最大数值达 32.2 毫米,这与周口店第一地点的相差较大,而 1978 年的发掘材料记述的下颌骨测值达 30 毫米和 28.3 毫米,这样,其下颌肿厚程度没有达到周口店第一地点的下限,故金牛山的标本为大角鹿未定种 (*Megaloceros* sp.)。庙后山的肿骨鹿标本较典型,仅次于本文描述的标本。所以,帽儿山出土的肿骨鹿是目前东北地区中更新世地层中所发现肿骨鹿最典型的材料之一。

4. 结论

通过对帽儿山动物化石群的研究,可以初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 帽儿山洞穴出土的动物化石,无流水冲蚀的现象,钙质胶结严重,说明地层是原生的。在这些动物化石中,具有代表时代意义的化石种类有肿骨鹿和三门马,鬣狗的化石材料很少,仅一件前臼齿的齿冠部分,无上下裂齿,故很难肯定是中国鬣鬣狗。野猪的标本也较少,虽有李氏野猪的某些特征,但材料尚不充分。其他种属都是中更新世常见的种类。

在帽儿山动物群中,没有发现东北晚更新世披毛犀—猛犸象动物群的典型成员,更多特征反映的是华北地区周口店动物群的特点,且不具备南方动物的种属。目前东北地区发现的中更新世时代的动物群,有金牛山动物群、庙后山动物群、辽阳安平动物群、营口藏山动物群等。从上述几个动物群看,帽儿山肿骨鹿下颌骨肿厚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地点。三门马牙齿构造也比已确认的庙后山三门马更具典型,所以,帽儿山洞穴地层时代应略早于金牛山和辽阳安平,可能到中更新世中期。

(2) 根据帽儿山动物群生态习性分析,这些动物大部分是栖息于草原——森林地带,如三门马、野兔、肿骨鹿、鼯鼠等均生活在草原、山地丘陵处。一些食肉类动物如狼、熊、獾、鬣狗和野猪等生活在森林、灌木植被茂密的环境里,总的看来,这些动物都是属喜温暖、湿润气候的典型种类。此外,帽儿山化石地层以红色—棕红色黏土堆积为主,并有多层的钙质结核,这些都是在温暖、湿润的环境中形成的。这说明中更新世中、晚期,帽儿山一带的气候比今天要温暖、湿润。

(3) 不同时期的动物牙齿和骨骼,是研究古动物演化的重要依据。帽儿山发现的三门马化石材料比较丰富,有完整的上、下颊齿齿列,庙后山遗址仅发现一个右下颌骨,但齿列不完整,金牛山的三门马材料更少,只有零星牙齿。由此可见,帽儿山三门马的材料是极其珍贵的,它对研究三门马从中更新世向晚更新世演化以及向东北亚的迁徙具有重要意义。

(4) 帽儿山动物化石地点是辽西地区首次发现且有可靠地层根据的中更新世地点,其动物群的时代也是辽西地区目前最早的第四纪哺乳动物群,它的发现为中更新世地层剖面对比增加了新的材料,同时,也填补了这一带地质填图上的空白。该地点虽未